



人民军队的建军背景和发展

——建军节前谈建军

陈志杰

一、人民军队的称谓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历史上有多个称呼,1927年8月初创建革命军队时,名称不统一,分别称“农军”、“工农讨逆军”、“共产军”、“土地革命军”、“农民自卫军”、“国民革命军”,两湖地区起义部队叫“工农革命军”。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我军名称统一为“工农革命军”。1928年5月,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我军更名为“红军”,并逐步形成全国统一红军序列。1931年1月7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议告全国工农红军书》,第一次使用“工农红军”称号,由此,各地党领导的军队称“工农红军”。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8月25日,北方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46年9月,我军开始使用人民解放军称号,1947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名义发布命令。1947年3月24日,新华社第一次公开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名称。此后至今,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即统一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二、建军背景和过程

(一) 建军背景

1. 国共合作破裂,使得我党不得不独自建立、领导武装力量以反抗残酷的军事镇压。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新右派迅速得势,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中共党员被排挤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党右派制造的整理党务案,使共产党员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职务,失去对党务的影响。期间,共产党方面主事的陈独秀、鲍罗延一再退让,使得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1925年国民党二大召开,使得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为少数派,而极力反共的蒋介石的地位则迅速提升。北伐战争获胜后,蒋介石强行改组一些地方党部,破坏工会、农会。1927年3月6日,杀害赣州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不久发生“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中共被迫转入地下。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当郭亮的头颅被悬挂于长沙城门时,鲁迅说过:“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残酷的反革命镇压活动,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只有以革命的武装进行坚决地反抗才能求得生存,才能将民主革命进行下去。

2. 中共已经掌握了少量武装,初步具备了建立人民军队的物质基础。在大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各地工人、农民运动,组织了为数不少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这些武装力量在配合北伐军北伐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中国共产党还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如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11军、20军的部分部队以及武汉国民警卫部队一部等。这些武装力量为中国共产党奋起反抗奠定了最初的物质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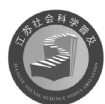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3. 中共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进行了领导层的改组,成立了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5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结束了坚持右倾投降政策的陈独秀的统治。该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立即进行南昌暴动。1927年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决定秋收起义。从中共中央领导层来说,武装斗争成为这个历史关口中国共产党坚定唯一的选择。

(二) 人民军队初创

1. 南昌起义创立了我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军队。在抵制了张国焘的阻挠后,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于1927年8月1日2时发动了南昌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之11军24师,叶挺为师长;20军,贺龙为军长;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德培的一个直属警卫团;第3、9军各2个团,第六军1个团。一共1万人。起义胜利后,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起义兵力达到2.2万人,编为3个军。8月3日,起义军被迫离开南昌,南征广东,9月底在汤坑遇敌,大败,余部1200人撤往海陆丰。分散到各地的指战员,成立了一支支革命武装,其中,朱德、陈毅率第25师转移到赣南、闽南,保存下800人,1928年4月辗转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成立了全国第一支正式红军——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八七会议”标志着党在方针政策上的转变,而南昌起义则在实际行动中实践了这一方针,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立人民军队的新时期。南昌起义部队虽然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但





政治上已置于共产党领导之下，党的前敌委员会是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各军、师设立党委，各团建党总支或党支部，各级配备了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指导员等专职政工干部，各军高级指挥员多是共产党人。南昌起义培育了大批军政干部，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中，周恩来、朱德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十大元帅中，参加南昌起义的有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林彪六人。叶剑英虽未直接参加起义，但起义前后都做了协助工作。大将、上将中参加南昌起义的有粟裕、陈赓、许光达、萧克、周士第、赵尔陆等。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规定“每年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从此“八一”成为人民军队的建军节。后来在设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时，毛泽东还特别指示，军旗上要有“八一”两字。

2. 秋收起义为我党建立了第一支正式红军。在“八七会议”后，中央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8月18日湖南省委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秋收起义应高举共产党旗号，不再打左派国民党旗帜，国民党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9月初，毛泽东到安源，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参加起义的力量有：国民革命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浏阳农军，安源路矿工人武装，共5000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部队分三路，从修水、铜鼓、安源三地起义，准备会师长沙。9月9日以破坏汉粤铁路为标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起义失利，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向罗霄山脉中段





转进,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性一步。经过9月29日的三湾村改编,起义军队成为了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的茨坪,标志着我党创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1928年4月下旬,朱、毛部队会合于宁冈砦市,联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6月,编入红一军团,这是中国共产党组建的第一支正式红军。

3. 其他一系列武装起义创造了多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1927年12月11日3时,广州起义爆发。参加起义的有: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一部,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成立了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太雷为委员长,起义军总指挥部负责作战,叶挺、叶剑英为正、副总指挥。12月12日上午,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成立,苏兆征为主席。起义部队与敌军激战后失利,余部1000多人撤出广州,其中大多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转战到海陆丰,与澎湃农民赤卫军会合,少数一部在北江地区加入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中。1928年3月,贺龙、周逸群在湘鄂西起义,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1930年7月,改为红二军。1928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湘军起义,建立红五军;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右江革命武装在百色起义,成立红七军。1930年2月,邓小平领导左江龙州起义,成立红八军。1930年2月,周逸群、段德昌统一洪湖地区革命武装为红六军。1927年11月,潘汝忠、吴光浩领导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起义,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军。1929年5月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领导的河南商城起义和1929年1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领导的安徽六安霍山起义,建立了红11军,1930年改编为红1军。另外,方志敏、邵式平在赣东北,刘志丹在陕西渭南、华县,闽





西、湘南、海南岛等地区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并建立了红军队伍。

三、我军由小到大发展的原因

(一) 有党的坚强领导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通过长期人民战争战胜强大敌人而取得的。在革命战争过程中,人民军队显示出中国其他一切军队所不具备的强大力量,而这种力量主要来源于强大的精神武装,这种可以转化为巨大物质力量的精神张力又主要来源于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证军队无产阶级性质的前提,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1927年9月,毛泽东主持了对秋收起义部队的新式整编即三湾改编,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早的富有鲜明思想政治工作色彩的整编活动。其主要内容是“支部建在连上”,即在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实行党代表制度,使这一支来源不同、组织成分复杂、政治素质不强的军队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强有力的革命武装。1929年12月,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强调: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更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此后的各个时期,进一步完善了军队内部的党委制度,强化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经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工作,将服从于党的领导内化为人民军队的政治信念,使人民军队具有了铁的纪律和坚不可摧的精神力量,从而多次转危为安,最终走向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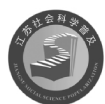
（二）有人民群众的最大支持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时起就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坚定的政治信念,她所领导的军队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的宗旨。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时,就要求部队官兵对待人民群众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1929年以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规定。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言简意赅,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民一致的原则,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宗旨意识的牢固确立,使得人民军队为了人民、人民军队依靠人民,成为党的武装力量的坚强信念和自觉行动。

由此,人民群众把我军真正作为自己的部队,给予了最坚决的支持。据统计,至1934年4月,仅中央苏区就有赤卫队、少先队员合计51.3万余人。1932年2月至1934年7月,扩红总数达到16万余人。其中,兴国县总人口23万人,参加红军的多达8.5万余人,该县为革命献出生命的烈士高达2.3万人;瑞金县总人口24万人,参加红军的有4.9万人,牺牲者1.7万余人。红军长征开始前,受命随军的挑夫就达5000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过程中,配合人民军队作战的民工更是高达529万人,人民群众为人民军队提供了9.5亿斤粮食,确保了战争的胜利。

（三）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

革命战争时期,人民军队始终处于军事实力上的不利地位,要以弱胜强,就必须采用特殊的战略战术。





1. 积极防御(攻势防御)战略。毛泽东把积极防御战略具体化为“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即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把防御和进攻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战略上的防御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结合起来,把战略防御及时地导向战略进攻。贯彻积极防御战略要坚持的原则:诱敌深入、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诱敌深入原则在敌人进攻我根据地时经常采用,主要是保持内线作战,依靠根据地人民支持,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集中兵力原则一直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原则。运动战是正规兵团在比较大的区域和比较长的战线开展的大规模机动作战,以大量歼灭敌人作为作战目标,是我军主要的作战形式。1927年到1930年之间,红军力量十分弱小,采用的是游击战形式,到1930年初,红军发展到13个军6万多人,于是对红军主力进行整编,并改为以运动战为主。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作战原则要求: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速决战和歼灭战原则是战役战斗中的基本要求,孟良崮战役就是运用此原则获胜的典型战例。

2. 把游击战争适时提高到战略地位。毛泽东把作为战术问题的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来考察和运用是创举,他曾经指出,游击战和带有游击战的运动战是中国革命长时间的主要作战形式。1929年4月,毛泽东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概括为:“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种作战形式不仅红军时期运用,抗日战争时期更是成为新四军、八路军的主要作战形式。

3. 正确地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正确地实施战略转变,是获取





军事胜机的高超艺术，我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了多次军事战略的有效转变，加快了战争胜利的步伐。1930年实行了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以游击战变为某种程度的运动战。抗日战争爆发后，由集中兵力打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转变为分散兵力到敌后打游击战。解放战争中转变为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并实现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的战略转变，缩短了解放战争的进程。

（本稿由南通市社科联推荐）



陈志杰，1964年出生，江苏南通人。南通大学法政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江苏省党史学会理事、南通市史学会副会长、《廉政文化研究》杂志副主编、《苏东论坛》杂志副主编。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公开出版、发表的学术著作、学术论文40多部（篇），多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用。

